

21 世纪重大话题

灵魂自然死亡

宗教与科学的接点

(日) 河合隼雄著 公克 晓华编译



A0444808

B92
1-126

(辽) 第 9 号

灵魂 自然 死亡

——宗教与科学的接点

〔日〕河合隼雄 著

公克 晓华 编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787×890 1/32 印张: 6 字数: 120千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责任编辑: 刘雪枫 封面设计: 吴光前

责任校对: 东 雪

ISBN 7-5610-1452-X

Z·028 定价: 3.20元

前言

科学发达了，人们能透过一滴晶明的水珠看到分子，原子，乃至瞬息即逝的微粒子；又能飞离地球，进入太阳系，并正向银河系，以及更广昊的宇宙发出挑战……

近二百年来人类所创造的自然科学几乎光顾了实存世界所有引起疑问的角落，唯独留下了人“自己”这一块相比之下几乎是无知的荒漠——

人类经过数十万年漫长的岁月，在形成自己和进化自己的同时，创造了宗教和科学。虽然多数人认为科学是与宗教对立而生，却至今不能彼此否定。如果说现代科学的进步给人以差不多解明了世界上（人以外）百分之九十的问题的印象的话，那么它对人的内在世界却可以说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没有解明。而被现代科学排斥为“荒谬的”宗教，则以另一种代替语言说明的“修行”手法处理着人的内在世界的问题。

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作为今天的人是否应该把这祖先数万年积蓄下来的遗产毫无偏见地承接下来而继续思考和发展下去呢？

作者河合隼雄并不是一位信教者，他是日本著名的心理疗法专家。既受过完整而专门的西方心理治疗训练，又对东方人特别是日本人的意识结构有过独到的研究。他的著作多从自己的临床实际体验出发，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参考价值。

灵 魂

○话从这里说起

近来，一种新提法频频出现在日本的新闻界，这就是“新科学（New Science）”。它原指70年代初期发起于美国和英国的新世纪科学（New Age Science）运动。这个运动正在扩展到整个欧洲，并且大有越燃越烈之势。新世纪科学运动有这样一些特征，首先，它不象以往科学运动那样只属于尖端领域里的专家、科学家，而是把文化界的各种学者，以至普通老百姓也卷入其中；其次，它把迄今为止始终被视为绝对对立的宗教和科学，以思维以外的形态联系了起来。“宗教与科学”这一课题，对于思考“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的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生存于今天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认真地正视的问题。

笔者是数学专业出身，后来转向临床心理学。从此我便一直置身于和有生命的人打交道的研究领域。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始终对以人为研究对象的方法论和科学论抱有极大的关注。可以说，对心理

疗法的经验积累得越多，就越会不得不考虑人类的宗教性问题，越会被置身于科学与宗教的接点。我之所以试以“宗教与科学的接点”为议题写作此书，正是基于我的这种切身体验的激励。不过，现今的新世纪科学运动不仅涉及深层心理学，还触及许多其他专业领域，诸如理论物理学、大脑生理学、生物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等等。对于这些浩瀚领域里的新学科，要想全部概括理解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只能限于自己的能力所及，即从一个心理疗法家的专业立场出发论说宗教和科学的接点问题。倘使这一冒举碰巧成了“抛砖引玉”的机缘——引起各专业领域对“宗教与科学”问题的共同大讨论——笔者感到无比荣幸。

1985年4月23日至29日，第九届“超越自我”国际会议在日本京都国际会场召开。“超越自我”这个词儿也译为“超常体验”，是日本人不大熟识的。超越自我的国际会议最早的一次是由国际超越自我心理学会发起于1972年，召开于冰岛，而后，引起多方关注，非心理学专业的与会者不断增多。至1978年第四届学会召开起，正式定名为国际超越自我学会（International Transpersonal Association）。所谓“超越自我”这个名词来自于Transpersonal，原义是“超越个人”，它的创义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人的最根本的基层上存在着一种共通的、超越迄今为止西方人所一直高度

肯定的“个人”的“超越自我”的欲求。那种把“个人”或“自我”看成是过于脱离“他界”的存在，传统观念过分地助长了“割裂离散”的思想方法。例如在考虑诸多相关事物的联系，象考虑物与心，本国与他国等等问题时，都过分偏于割离的认识态度。而立足于“超越自我”、“超越个人”的这种新心理学的思想方法则是要超越上述那些传统观念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众多界限的束缚。始终被视为对立物的宗教和科学问题就是这众多界限中的一个。可以说本书的论述即是一次超越古老传统界限的尝试^①。

笔者曾作为日本国的组织委员出席了在京都举行的那次国际会议，并发表了研究论文。这次会议莫若说就是一次关于“宗教与科学的接点”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它对我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给予了大量的启发和帮助。

① 关于Transpersonal心理学，有解为“超越个人或自我（意识）的心理学”，有解为“超常体验心理学”。这是一种与传统心理学相区别的新心理学思潮。传统心理学所研究的行动学或精神分析学都是以“个人”为人的基本存在单位，即以欧美的传统个人主义为当然前提的。而新心理学则突破这个前题，以超越个人存在的体验为研究对象。所以也可以说，这是心理学内部的一次革新运动。这个运动着眼于通过坐禅、冥想、瑜伽等气功手段获得的“显灵体验”、“催眠体验”、“宇宙体验”等等“超自然”体验的机理研究。所以带有着向传统的“宗教与科学相对立”的观念的挑战意味。——译者注。

○超越自我学会

也许是由于瑞士的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C·G·荣格（Carl Gustav Jung）派的精神分析家们大多投入了对它的研究，笔者较早便对超常体验心理学有所了解。但是真正涉足这个领域却是在1983年我应邀在瑞士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超越自我学会上发表论文的时候，那时我以为能在会上发表论文的必是一些著名的精神分析专家、学者，所以怀着十分荣幸的心情前去赴会。结果令我大失所望——直率地说，那似乎是个名不副实的会议，也许因为我当时刚刚出席过也是在瑞士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两次会议的气氛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格外令我失望。刚刚开完的那个专题会议不仅是一次学术性会议，而且整个会议程序都是古典式的。因为我是初次参加，深受感动。相形之下，超越自我的国际会议就象是个吵吵嚷嚷的庙会，参加者不少是举止古怪、形迹可疑的人，在我的印象里留下了很深的疑虑和阴影。

但是，当听了几个大会发言以后，我发现竟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论点。围绕着“宗教与科学的接点”这个议题，似乎一种新的思路正在被开掘，探索的热情令人感奋。渐渐地，我也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然而，有两点我是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

一是对东方的注目走到了极端，以至有人发言说“唯有东方国家才是拥有深奥智慧的国家”；另一个是那些对“科学与宗教”议题的关注简直可谓达到狂热程度的人物。虽然在正式的大会发言者中还不至于出现这种人物，但是在各种自由讨论的场合，几乎只要涉及“科学与宗教”的问题，他们就必定露面亮相。最后我终于按捺不住心里的不满，站起来讥讽说：“诸位能否告诉我所谓的‘东方国家’究竟在哪里呢？我便是个东方人，但我没有见过诸位所说的那样的‘东方国家’。”

还有一点也曾令我不解，那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负有盛名的例如 C·G·荣格派的精神分析家们竟然不惜自筹高昂的旅费和会费，长时间请假中止手头的工作，专程前去倾听会议的发言？这对于一个习惯于日本式的忙碌工作的人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与他们深入交谈以后，我明白了他们的行动是出于一种追求真知的强烈热情。他们对“宗教与科学”，对会议中频频谈及的“魂的世界”（Spirit 这个词儿，无论译成“魂”，还是“灵”，或是“精神”，我都觉得有不尽意的地方，在此权以“魂”为代译），对这些超越常规“个人”的现象抱有极强的问题意识。同时，他们对现代欧美文化的危机意识也相当强烈。所以他们不愿丧失任何一次深入思索与探讨的机会。

或许日本人对这些难以理解。首先，他们的那

种强烈的危机感就很难传达给日本人。比如这次会议上多次提到的对核武器的危机感，日本人就远比欧美薄弱得多。一方面，出席会议的多数日本人恐怕都为各国对核武器的危机感如此之强感到惊讶；而另一方面，其他各国人则可能反过来，对有过亲身受害于原子弹爆炸经历的日本人竟然如此缺乏对核武器的危机感而感到惊讶。最近来日本访问的宇航员 R·舒威卡特曾经这样评论过日本人的这种特点——“日本人自恃自我平衡感觉好，稍有摇动，瞬间便会恢复原态，所以很多人抱有安心感。这就好象一只在海上航行的船左右摇摆着前进一样。但是，当摇动的幅度超出一定限度的时候，船就会进水，以至于无可挽救地沉没下去。现代核威胁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不就是这样吗？”R·舒威卡特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形容了日本人特有的乐观性，不如说是巧妙地表现了“听天由命”、“听其自然”式的安心感的可怕性。欧美人则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对核武器具有强烈的危机感，还进而把它归为西方近代文明普遍危机的一例来抵制，并且具有一种“务必从此找出突破口”的紧迫感。

在言及“西方近代文明”的时候，日本人往往多有误解，其中一点就是把西方的近代科学与基督教过分对立起来。实际上，近代科学与基督教并非是象日本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的对立物。甚至不如说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一点，在科学哲学家

村上阳一郎先生的一系列著作中曾有相当详尽的论述，笔者甚为赞同。在这些著作中，村上先生列举了大量史实例证，说明历史上17、18世纪的那些所谓“科学天才”，当时研究自然现象的态度和方式并不是象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富于“科学性”和“合理性”。哥白尼、伽里略、牛顿这些举世共知的科学家，“他们毕生矢志不渝追寻探索的关于大自然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们要知道圣书里所描写的那些上帝创造世界的各种故事背后隐含着的造物主的计划，他们要发现这个计划，赞美制造了这些计划的上帝的光荣。”

（引自村上阳一郎先生著作《科学能评判人吗？》）换句话说，他们创造自己的科学体系的高度热情全部来自一个唯一的动力，那就是希望知道“上帝的意志”的强烈欲望。

的确，经过18世纪自由思想家们的努力，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知识（Scientia）不再被认为是表现上帝的意志和赞美上帝的光荣的标志了，而成了能够带给人类现实的幸福的能力的营养而被普遍地追寻。但是，即使这样，唯一的绝对的“上帝”屹立于一切之上的思维倾向也仍然留于人们的潜意识之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完整思想体系是唯一的，用它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也包括人类社会现象）”，或者“非如此干不可”的强烈意图性。

这其中共同的潜在观念是——强烈地确信“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东西是唯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始终把进化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等视为基督教的对立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一个视野更广阔的高度上统观它们的话，就不难看出，它们之间有着更突出的共同点，即都是早年犹太——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的延续，理解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超越自我”学会的参加者们，当他们感觉到西方近代文化的危机，试图重新看待它的时候，他们不是仅仅针对自然科学而言的，对基督教的重新审视也在他们的探讨课题之中，他们从这种自觉的审视中强烈预感到欧美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和丧失，预感到一种新的思路被开拓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一旦有象超常体验国际会议那样的寻找新思路的机会，他们是不惜高昂旅费和会费的，如果把这种机会看成是与自身生存与否的根本问题相关连，那么这点支出实在谈不上昂贵，在他们看来，倒是对这样重大的议题竟然显不出多大兴趣的日本人真正才令人不可理解。

在日本召开的第九届超越自我国际学会如约进行。会议没有出现熙熙攘攘的庙会场面，也没有“古里古怪，形迹可疑”的发言人，可以说十分成功。付费参会并申请发言的出席者达200余人，但是除了事先邀请的发言人外一律拒绝。或许正是由于

这种过分严格的会议规程，这次会议较之瑞士召开的那次会议参加者减少了许多。不过，超越自我国际研讨会似乎很肯定这次会议的做法，今后似乎仍打算继续这样做。看来，一个新兴运动的初期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令人不易理解和接受的成分掺进来是难以避免的。

尽管我在事前已向巴尼会长介绍过日本学术界对“超越自我”研究的态度，但是一些到会的外国学者似乎仍然为此感到惊奇。例如宇航员舒威卡特曾说：“实际上日本的科学家们相当僵固(vigid)。”日本的学者、科学家们只要一听到“宗教”或者“魂灵”之类的词儿，其他的什么也不听，就会立即判断“这是非科学”，甚至于更进一步断定：“这是欺骗！”

有一位学会的干部，听我述说为这次会议征求参加者如何如何费尽辛劳后，不以为然地说：“日本是最应具有‘超越自我’的土壤的国家，怎么会是这样？！”于是，我不得不耐心地向他说明日本的现况——虽然可以说日本远比欧美具有“超越自我”的传统，但是进入近代以后，日本的知识人始终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楷模，不遗余力地追赶西方，结果反而比欧美的现代人对西方近代文化更尊崇更忠实。我的这些说明幸得那位干部的理解。关于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东方和西方”一节中进一步论述。

当然，这只是日本学术界的一部分倾向，事实上，即使是在日本最尖端的知名学者中间——尽管有些是毫不声张的——对于超越自我相当有见地的也不乏其人。杂志撰稿人增永俊一于1948年曾撰写了一本叫《生命的最前线》的书，这本书就是采用和日本学者对话的方式论述了“宗教与科学的接点”问题。

近来的新闻界不断介绍日本的传统艺术和技能，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们在说明日本传统时，常常习惯于这样一种表现方式：“与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应，日本是精神的……”云云。这时，有位西方人针锋相对地问道：“那么，为什么现代的日本人成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物质文明的享受者呢？”这个质问的背后似乎还藏着更深的含义，而提问者没有直说。我想他的真正意思是否是说“这样‘尊重精神性’的日本人怎么会成为一心追求经济实利的买卖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西方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日本）是精神文明”之类的看法是日本人的—种偏见。西方之所以发展了有关物质方面的科学学问，是因为原有的基督教的精神支柱。而当日本引入西方文明的时候，是把基督教与物质科学分离，排斥基督教引入西方近代文化的。因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往往给人或则“误解”，或则“经济实用主义”的印象。倘

使追问一句“所谓‘日本精神’是什么呢？日本的宗教性特点是什么？”，日本人实在无言以答，

○个人之存在

Transpersonal即本书所使用的“超越自我”的词语的英文原义是“超越个人”，也有译为“超常体验”的。但是这种原义的意思决不是指“不重视每个人的个别的存在”。相反，它的含义恰是强调重视“个人的存在”。笔者通过参加超越自我大会得到的最切实的体会便是——一个人“在那里存在”是个多么重要的事情！约翰·威·伯利是一位相当著名的分裂病心理疗法专家。但是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只字未提自己最有研究的有关分裂病的话题，却谈起了中国古代关于“王”的观念。我一面听他谈中国古代人心目中理想的“王”的形象是“无为而治（即“圣人之德高不在道德说教，而是自然而然地感化人民”之意——译者注）”，一面想：“他的真实旨意不正是在谈有关分裂病的心理疗法的根本问题吗？”尽管他又谈了古代王“获得权力后就堕落”，变得“贪得无厌，欲支配一切”之类的话，但是他所主要陈述的关于古代王的形象实际上是和心理疗法医生的姿态相关的。

精神分裂病的治疗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伯利以他长年不懈出类拔萃的工作赢得了我的注目和

敬重，我借会议的机会向他请教了关于治疗分裂病的许多问题。他对我谈了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会上发言中提到的关于中国古代王的那些议论的中心思想，他说，对于分裂病患者，无论他怎样被妄想和幻觉所折磨，怎样发狂躁乱，也不要采取千方百计令其镇静下来的治疗办法，即不能以医者为主导使患者镇静，“我们的工作不是让患者从自我中心中脱离出来，而是一直守在患者身旁”，这样患者就会渐渐平静下来，这种医疗经验在某些人听来很可能是愚蠢得可笑。但是，如果联想到伯利曾经谈到的“中国道士那样的安祥宁静之中显出的严肃气氛”，恐怕也就可以悟其一二了。不过，一直守在分裂病人身旁，而且是任其所为，听其“自我中心”所然的“守在身旁”的这种做法，谈之轻松，行之甚难。对此我深有体会，莫怪乎在我与伯利谈话近尾声时，他说：“治疗分裂病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我老了，不行了。最近已经不再直接诊治病人了。”的确，“无须做任何事情地守在身旁”，这是一件不知需要投入多少精力的艰苦工作。

“超越自我”心理学，正如前述，是诞生于从事心理学研究，特别是从事心理疗法研究的人们中间的。对于这个过程，我想做几句说明。心理学最初的起步是以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为规范，从实验心理学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感到，每当处

理人的“意识”之类的问题时，就陷入了方法论的混乱，无以自拔。于是为了追求纯客观地观察解释人的“意识现象”的可能性，一些学者以人的“行动”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所谓“行动主义心理学”。那时候的理论心理学受条件局限，过于依赖方法论的确认，但是行动主义心理直到现在还在发展进步。然而，当心理疗法产生以后，仅仅解释人的“行动心理”就不够了，还不可避免地必须处理人的意识问题。一个人患了神经衰弱症，他害怕见人，总是躲在家里不敢外出。对这种患者，心理疗法首要的问题就是弄清楚“他的‘怕见人’的意识究竟是什么”。

开创了精神分析学的弗洛伊德曾以“无意识”为研究课题。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以“意识”为问题追索“无意识”、尽管弗洛伊德以“无意识”来表述他所分析的对象，而实际上经过分析而取得结论的过程还是由“无意识”到“意识”的意识化过程。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也可以说还是以“意识”为研究课题，以“意识”为问题的。但是，弗洛伊德的研究“意识”的重点与行动主义心理学不同，他的理论表现出尽可能沿袭19世纪的科学模式的特征。就是说，他的理论是基于“因果决定论”来展开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论述到——就是说这里面隐含着方法论的问题。总之，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明显的“科学”色彩，是它之